

地域文化散文书写的艺术追求与价值

——评孟丰敏的散文集《乡愁里的福州》

张翼,张宇

(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孟丰敏的散文集梳理并串联起各处的史料、遗迹,以文学眼光与精神向度回顾历史选择,书写闽地的沧海桑田。以文学的温度和史学的厚度勾勒民情风俗画像,把个人情志与历史概括相融,在人文意象中深化理性哲思,展现中西文明在闽都交汇形成的复杂景观。作者在文学与历史话语的互动中完成对故乡的别样书写,以独特的审美触角探测历史深处的人性和民间精神的脉络,赋予地域文化鲜活的当下意义,丰富了文化散文创作的审美参照系。

关键词: 孟丰敏;《乡愁里的福州》;地域文化;散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2)02-0199-06

Artistic pursuit and value of regional culture prose writing: comment on Meng Fengmin's prose collection "Fuzhou in Homesickness"

ZHANG Yi, ZHANG Yu

(Foundational Course Depart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Meng Fengmin's prose collection combs and connect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lics, reviews the historical choice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and writes about the vicissitudes of Fujian. With the temperature of literature and the thickness of history, it outlines the folk customs, integrates personal feelings and historical generalization, deepens the rational philosophy in the humanistic image, and shows the complex landscape form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the capital of Fujian. In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iscourse, the author completes a different writing of his hometown, explores the human nature and folk spirit in the depth of history with a unique aesthetic antenna, endows the regional culture with fresh current significance, and enriches the aesthetic reference system of cultural prose creation.

Keywords: Meng Fengmin; Fuzhou in Homesickness; regional culture; prose creation

孟丰敏的新作《乡愁里的福州》是讲述闽都人文历史的散文集。作者的文学创作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集中讲述宋元以来,尤以明清为主要时段福州城的历史变迁,也是其前一部散文集《流翠烟台山》的延伸与拓展。作者娓娓道来,展示福州作为世界茶港的悠久历史。跟随作家笔触,卷轴画在时光隧道缓缓打开:从闻名世界茉莉

花茶之发源地,到作为海上航标的镇海楼,从因海上丝路而繁华的安泰河酒肆歌楼,到南宋流亡小朝廷暂居的林浦村,生动再现一段段繁华离奇的福州历史。从册封琉球使的一品大员齐鲲,到可歌可泣的抗元英雄陈文龙,作者无不细致描摹,让历史人物从沉闷枯燥的史料中走出,形象饱满,趣味盎然。福州港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

泊地,与许多名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先辈冻结在历史典籍里,庄严肃穆,只有在文学描述中才真正鲜活起来。记忆体验是历史的根基所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认为:“对于我们,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我们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1]作者对历史、故乡、记忆的别样书写让地域历史与现代生活得以情感联结,让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因在文学记忆中赓续,完成历史的内在连续性。这种对地域文化的书写也引发我们对历史与文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思考。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力图呈现散文艺术书写在增益地域文化审美与历史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探讨文学表达与历史文献的对话、互动能否丰富读者对历史与当下的理解和发现。同时尝试从史学视野分析和探究文化散文创作的文体特点、艺术追求、价值意义和精神结构,为散文批评提供新的理论参照,更好地观察地域文化散文创作的成败得失。

一、呈现史学视野与文学描述里的风土物产

开篇《东冶茉莉味的乡愁》介绍福州市的花——茉莉花。东冶,是福州的海港。作者从童年生活起笔,追忆了与茉莉花有关的往事,让乡愁借茉莉花从记忆的深层浮到意识的表层。茉莉花芬芳而不袭人,自古以来雅俗共赏。从《浮生六记》才子沈复对爱妻芸娘茉莉花发饰的赞美,到寻常人家茶缸浸泡的茉莉花茶,再到街头巷尾售卖的茉莉花香袋,作者感叹花香跨越时空,将古今爱花人联结在一起。文章追根溯源,探讨了来自异域的茉莉花(梵文 mallik)在福州广为种植的原因。以史料汉朝陆贾撰写的《南越行记》为证,从福州的地域优势、土壤特点、气候条件等因素说明此地遍植茉莉花,成为花茶最大产地的原因。文中摘录明代朱权《茶谱》对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的解说,显示此地花茶制作的悠久历史;茉莉花茶还曾是皇家贡茶和海丝之路的热销品。行文如止于此,也只是知识性散文。紧接着,作家以徐渤、林则徐、冰心等不同时期当地名人文学作品里对茉莉花茶的描绘佐证当年闽地香飘四野的胜

景,还例举清朝法国驻福州副领事保罗·克洛代尔称此处为“花与蜜的城市”来印证“茉莉之乡”的美誉实至名归。文末以传统节日七夕夜福州女子乘船抛撒茉莉花寓意“莫离”期许爱情恒久的民俗活动,展现茉莉花深植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茉莉花不仅是地方特产,也涉及文化习俗和价值关怀,洋溢着浓烈的乡土气息,构成闽中区域特有的文化心理景观。在对故乡名人的深情追忆和民间民俗的引述里,作者将个人情志与历史概括水乳交融地化合。“关于民间民俗的知识或记忆从具体的历史形态深化为充满理性判断力和深邃感的历史与文化智慧,在这种历史与文化智慧的观照之中,知识、文化或记忆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存在,散文中大量的关于民间民俗知识的引述,也在无形之中深化为一种文化批评或文明批评的话语方式……”^[2]这是学者郑家建对周作人散文艺术的赞赏,也是孟丰敏文化怀乡之作的用力之处,从中可以窥见其独具个性的审美心灵和历史洞见。当然,要达到大师们的智性高度,作者尚需积以时日。

在《织田信长与洪塘瓷》一文,作者先解说日本茶道重视表演的古老传统以及对茶具器皿的重视。日本点茶所用的浓茶小罐被视为茶道文化中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其中幽静深邃的黑陶茶器被尊为“唐物茶入”。可惜,长久以来“唐物茶入”的产地始终是个谜。直到20世纪末,福州在旧城改造中发现了洪塘窑出土的宋元时期的酱釉薄胎残器,因其与日本传世的“唐物茶入”相似,经中日专家的共同鉴定,确认了福州洪塘窑为“唐物茶入”产地。借助历史典籍,作者介绍洪塘瓷的工艺、质地、俗名、用途等相关知识,其旨意不是做瓷器学或考古学的研究,而是从中探究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来由,以及港口设立对本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民情、建筑风物等诸多方面带来的影响。文末引述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足利义满将军统治时期日本寺庙对中国瓷器的推崇,以及日本电影《本能寺酒店》里织田信长、丰田秀吉等贵族将“唐物茶入”作为身份和权势象征的情节,都佐证日本茶道对洪塘瓷的喜爱。行文中引用的动画、电影等文学资料能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致,史识中增添趣味性,读之令人信服和惊喜,其各种史料的引证对海运贸易和中日交流史的研究也有不凡的意义。文学通过栩栩如生的描

述来证明历史话语,民众的历史认知也多来自文学启蒙。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拥有不同的描述范畴和内在支撑,散文家南帆认为:“文学话语可能证实历史话语,也可能某种程度地证伪历史话语。对于‘历史’而言,二者的对话关系构成了历史连续性的丰富理解。”^[3]不论是“方山露芽”,还是“安泰河的夜来香”,故乡的风物在作者“史”的整体视野下进行文学的细腻描述和审美的情感解析,为读者了解闽地历史提供具体扎实而生动形象的细节支撑。历史典籍往往缺乏文学性,底气有余而朝气不足,难以给人审美的享受。从历史知识到历史认识,需要内在理性判断力的省思过程。地域文化散文的创作,既要体现作者独到的文学审美情趣,也要有个人的感受颖悟和智性锋芒。孟丰敏所具有的历史知识储备,以及对地域特点与文化人格的深层思考,使文章兼具生命之感、个人之思与地域特色,而没有落入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之中。史学视野下的文化散文写作有利于建构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但散文创作的生命力更在于展示一些历史的暗处、盲区或开启被社会巨型景观遮蔽的另一些主题,让那些没有进入历史著作的地域景观、人文现象得到文学话语的描述或补充,让文化记忆引发族群的人文情感,向历史的人性深处挺进,为当代文学的散文写作注入新的元素与活力。

二、挖掘古迹建筑里蕴含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记忆

福州原是水泽之城,当地人擅于操舟出海贸易,如今水路淤堵不复当年模样。曾经水路四通八达的繁华景象,已不太为人所知。孟丰敏在“后记”提到写作缘起是想写福州港的历史轶事,港口的历史变迁是散文集构思的内在逻辑,书中记述的各处古迹也跟水路海运有关。《镇海楼传奇》(第一辑似水流年的城)一文以福州俗语“南有火帝庙,北有镇海楼”开篇,对这处600多年古迹的存在表示惊叹。对与镇海楼相关的资料进行广征博引,仅直接引述的文献就有:《福建通志》《福州府志》《榕城考古略》《闽书·方域志》、李剑潭《镇海楼赋》、郁达夫《闽游滴沥之五》、谢章铤《重建镇海楼记》、何振岱《样楼望海》等十多处。古今关于“镇海楼”的典籍记录和文学描述不计其数,好在作者没有掉进长篇累牍的史料里,

而是选择侧重与港口有关的描写,“极目远眺闽江入海口时,甚至能看到东海……且夫楼以镇海名,意在楼,实在海”^[4]⁷³。镇海楼可作船入福州港时的航标,也昭示着闽人勇于开拓、征服海洋的雄心壮志。除了“镇守会城”之外,坊间还传闻其能抗镇台风的强大功效,是忠义精神和英雄形象的化身。历史著作中的史料棱角坚硬、逻辑固定,文学话语里的历史材料则柔软可感、主观片面。无论哪一种形态的资料,作者都能适当地接收剪裁,徐徐道来,给人以知识的启迪、历史的追思和审美的享受。

作者试图通过对旧故新典和逸闻趣事的挖掘,唤醒古建筑里层积着的诸多文化记忆。在叙述“镇海楼”经历的“九毁十建”的磨难中,孟丰敏流露出个性化的情感与思考,对“镇海楼”赋予人文景观的历史概括和文化记忆,让意象在内在情感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挖掘出人文意蕴,从建筑实体渐渐蜕变为情感符号、文化符号,将审美诗情与人生哲学融化在自然风物和人文历史的景观中。这个过程便是散文的审美与哲理深化的过程。细心的读者,沿着文章意脉可以解读出闽都文化特有的精神编码,即“楼毁魂在,楼生神来”。总之,散文创作如果没有乡土之情与人文之思的交织,就会雷同于地志民俗的资料汇编,而无法实现文学作为回应现实的另一种姿态和方式。如今,堆砌史料而无个人洞见的散文正被大量制造出来,这样的散文充其量不过是文笔略好的文献资料。当下散文的创作已不是发愁量的问题,而是要追求质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5]。一些散文作者由于缺乏个体文化人格的自觉建构,行文中的历史人文知识未能与个体心灵同步化合,个人情志与历史概括缺乏统一的生命,靠历史资料的堆积掩盖主体情志的缺席,造成散文“情”与“智”的分离。孟丰敏的可取之处在于用文化建构的话语重新阐释古建筑,表层是对历史遗迹的介绍和概括,其深层则是对地域与历史景观的崭新发现和文化阐释。可惜之处在于作者的胆识还不够大,有时困于“历史叙事”而止步不前。“历史叙事”和“文化记忆”虽有相同之处,但仍有所区别,否则没有必要创造两个术语。将“文化”与“记忆”相结合,有助于理解文化的历时性变化,弄清什么样的文

化形式能经年累月保持本色,什么样的文化形式会被岁月流转改变模样。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种精神形式,需要仪式、图像、文本、建筑物等实践活动或实物保存方式,“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6]。循此,古迹建筑作为文化记忆丰富的时空载体常成为作家笔下的意象。

在《柔远驿的往日繁华》里,作者阐述了“柔远驿”在明清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福州曾是琉球古国朝贡的唯一口岸,尤其海禁抗倭时期,福州是全国唯一开放的对外口岸,东南亚的进出口货物都必须经过福州,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会比五口通商时差。当时的进贡厂、柔远驿、造船厂等都设在上下杭与河口一带,船只经新港通闽江入海。作者分析琉球亲近福州的几个因素为:福建省舶司的设立及作用,福州港的形成和繁荣,两地地理位置与气候的近似,造船中心的影响,市舶司对琉球朝贡事务的管理,等等。作者不作全景式的描述,而是选择介绍明清两朝中琉两国的贸易活动以及清中叶五口通商时茶叶贸易促使福州从农耕社会向近代城市转型,呈现对外贸易和中外交流对当地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影响。地缘固然重要,若没有与之配合的开拓性实践,杂糅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外向的经济布局,光凭挟江出海之势福州也难以从边缘走向中心,难以走出林则徐、沈葆楨、严复、林纾、林觉民、冰心、庐隐等一大批名人。作家丰富而严谨的引述和考据使内容具有广博的知识性,通过对自主性和非自主性因素的分析,展示贸易交流活动对政府乃至民间所施予的深刻影响,引发人们对福州历史风貌改变的深层文化思考。作者多方征引,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行文从容不迫,史料之熟稔,运用之恰当,使之内化为文章的逻辑理路而不着痕迹。

作者可贵之处是能走进故纸堆,在驳杂史料里细筛辨析,结合现场采访和探寻,对柔远驿、福建省舶司、市舶府等古迹都有独特理解和新颖发现。作者能基于方志而不拘于史料,将深入采风与理性思辨融合,对闽都文化的形成提出大胆的个人猜想和文化诠释,文字到处其足迹亦到:“看那小桥流水浮鸭,青砖黛瓦人家,解了春裳放开一

片姹紫嫣红……想象当年琼河的驿楼、绘春园的繁华,不禁感慨沧海桑田。而河上春风依旧逐水东流,丽日莺花,绿柳摇影,古桥游船,来此观光者络绎不绝,却不知当年琉球与福州两地骚客风流事,东望扶桑人事皆非。”^{[4]208}从散文写作技巧看,这种情绪的流露,是作者在具体情境下不经意的点染,不露痕迹地从知识引述到实地考证,衍生出形而上的思考,使情感和智性在沉思地域文化的成因中结晶。这样的技法使孟丰敏的散文创作既显示求真务实的史学风格,又兼具灵动深情的文学笔墨和生命哲思。整部散文集的创作,作者始终注重史料筛选运用与实地采访的结合,将古迹的来源、特征、功用的相关述说放在人文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考量,参透人情物理,将历史知识转化为个人洞见,发幽古之情,扬闽风水韵,表现出自我的文化观念和思想立场。

三、探测历史深处的人性 & 民间精神脉络

《册封琉球使齐鲲》一文里,孟丰敏描绘了清代册封琉球使齐鲲出使琉球国(今冲绳)的惊险历程,让读者对两国交往史有所知晓,从而理解琉球国上至君王下到百姓对中国既爱还恨的复杂感情。明清时期,琉球与中国的交往中,比“册封”更频繁的往来形式是“朝贡”,在“朝贡”的名义下隐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琉球贡品主要是象牙、硫磺、马等物品,明朝回馈的是瓷器、茶叶、丝绸、铁器等商品,这些商品的价值往往超出琉球贡品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因有丰厚的朝贡“红包”,使他们时常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福州与琉球都城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千里,一路上多有岛屿,方便避风停靠,于是成为琉球朝贡的唯一口岸,也是册封琉球使出发的港口。“朝贡”并不是单纯的贸易行为,还涉及琉球国与日本国的复杂关系,从而使册封琉球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的意义。如此等等足以显示明清时期福州经贸繁荣和人情物理的区域特色都与当时海上的贸易活动息息相关。

在广阔历史背景下描摹人物,在叙写人物的过程展示曲折的中琉关系,二者相得益彰。两国关系因册封琉球使的活动而具体可感、波澜起伏,同时,人物形象也随着外交关系的开展更显饱满生动、奇伟卓绝。齐鲲作为册封琉球的正使,以正

一品大员的尊贵身份从家乡出发出使琉球,为琉球王举行隆重浩大的封王典礼,是齐氏族人的荣光。1800年当赵文楷手持龙节出现在福州南台港口准备出使琉球时,“江畔观者塞途”。齐鲲观望了盛大的出使典礼,并对好友梁章钜说:“仕途之荣斯为极矣,若出于吾邦士夫,则其荣当有加着。”^{[4]168}第二年齐鲲考中进士,随后在1808年他的好友梁章钜曾目睹他从福州港出发琉球,对其梦想成真感慨万千。

齐鲲被委以要职后,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辛劳和风险。册封使的工作艰巨而危险,不少官员都因恐惧而推辞这项差事。册封使出发前要殚精竭虑调动各方资源建造册封舟、征召人员,航行过程中如遇台风或走错航道,极易船翻人亡,当年赵文楷在归来途中还被倭寇袭击,差点命丧海中。对此,齐鲲早有思想准备。齐家文风炽盛,家教严正,齐鲲身上不仅有士大夫常有的家国使命观,还有不惧风浪、勇担重担的坚韧品格。这种开拓敢闯的海洋文化植根民间,也流淌在他的同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身上。民间文化传统常蕴藏着地域特色和独特逻辑,其精神血脉沉潜于代代闽籍人士的身上并生生不息。

地域文化散文的艺术追求在于挖掘被人们遗忘的重要记忆,再现历史人物的鲜活面貌和细部真实。描写齐鲲的成长历程和严以律己、谦卑自牧的个性,让读者明白其能勘重任、不辱使命的内在人格力量与地域精神。齐鲲在琉球国出使期间,奉公廉洁,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帮助当地人提高各种技艺,后被冲绳百姓誉为“友好使者”。文章通过介绍齐鲲出使前后的坎坷经历展示当年中日琉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贸关系,也为了解当今中日两国的微妙关系提供一种有价值的人文历史参考经验,对审视当下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篇文章包含大量的知识信息,所幸孟丰敏能点到散文创作的审美穴位,没有让考据资料成为文章的主体,令人沉浸其中。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对于散文而言,历史这个阔大命题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诉诸史料的历史传奇和历史苦难的演义,而是在于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这些段落和瞬间里面所蕴含的精神消息,往往才是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它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7]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叙写历史人

物的立足点。作者不是简单地转述史料,而是把考证资料作为背景,以文学方式回顾历史,与时代、文化进行精神对话,以个人的眼光和精神敏感向人性的某个区域靠近,力图到达历史的人性深处,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致力于史料背后的某种真相或结论。文学与史学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散文的书写要把握各自的优越性,才能理解它们不同的责任使命。

齐鲲在出使过程中提到:“国朝册封琉球,向例:请天后、拿公神像,供奉头号贡船;请尚书神像,供奉二号船。此次猝遇风暴,化险为平。二号船来往俱早到半日。”^{[4]281}由此可知,二号船上供奉的海神是尚书公,闽人尊陈文龙为“尚书公”。著名的抗元民族英雄陈文龙,为何会成为齐鲲册封舟上拜祭的神像呢?作者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在《尚书庙的海神传奇》里做了详实解答。南宋末年,众多复杂惨痛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事变成为士大夫各种精神选择提供了不同的阐释与言说的空间。作者客观地衡史论人,肯定陈文龙的人格气节,认同民间朴实的道德感。福建海神文化兴盛,福州更是众多海神的造神区域。当地百姓因敬佩陈文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义壮烈,集资建庙,奉陈文龙为水神,称作“水部尚书”,供奉陈文龙的庙因此称“尚书庙”。孟丰敏凭借对地域文化的深刻洞察力,揭示了福州民间海神信仰的内在心理需求,即“聚集在阳歧的与水运商贸有关的商人和水上疍民,需要忠烈勇猛的男性英雄作为神灵来镇压水里的妖魔”^{[4]274}。可见散文书写既要进入纷纭的地方史料,而又不能被庞杂的资料所困,把情感、智性和历史和谐结合后升华为感性的人文意象、推演出哲理结论才是地域文化散文写作的艺术真谛。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创作地域文化散文时,在有幸得到文献材料的援助后,往往容易被客观的史料压倒了主体的情感。“整篇完全被动地写历史的情况而窒息了诗情的,在学者散文中并不罕见的,远的如周作人后期的散文,近的如潘旭澜的《太平杂说》。”^[8]理论家孙绍振对两位名家作品的点评,对其他散文作者也可借鉴。

孟丰敏想必不会轻信迷信传说,但在其内心深处、在人情的体贴上、在人性的理解上,则希望有其事。作者愿意相信被乾隆皇帝加封的镇海王——陈文龙能保佑航运、渔民,甚至引用民间歌谣来增强“尚书公”庇护百姓的可信度。民谣的

演唱与民俗活动使人对“镇海王”天然生出一种亲切之感。“官船拜陈文龙、民船拜妈祖”之说至今仍在沿海地区口耳相传。时至今日,闽台及东南亚等地,仍将陈文龙奉为“海上保护神”。孟丰敏认为在虚幻的迷信中,自有美与善的存在,于百姓而言是一种很好的感怀与慰藉。作者既有朴实的民间立场,也有精英的人文立场,在对民间信仰的理解与同情中,透露出一种深厚的人性体贴与人文关怀。正是这种科学与人性、理性与人道、精英与民间等因素共生互融的文化情怀,构成了闽都区域文化人独特复杂的精神格局,形塑了闽派文学多元的价值追求与理论建设。

四、结语

文学就是怀着淡淡的乡愁,去寻找已逝的家

园。对于作者来说,她的故乡就藏在那些风物、特产、古迹和历史故事中,藏在亲情、乡情、家国情中。也因乡愁的点燃,那些纷繁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熔合,形散神聚。或许有人认为孟丰敏的散文缺乏对闽地文化人格的生成与演进的挖掘与批判,缺乏文化思考的力度与深度,但她不是南帆或谢有顺,她是孟丰敏,一个温情与韧性兼备的闽女子,她对地域文化的文学书写,是基于个人心性的自由抒发,其历史之思与现实之感都带着闽地水域浓浓的烟水气息。因此有理由相信,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写能共同扩张新世纪地域散文书写的审美版图。同时,期待地域文化散文的创作能在诗情审美、历史洞见与文化智性的多重维度下呈现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展示民间文化缤纷强劲的生命力,为散文创作提供新的艺术路径与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 [1] 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 张文杰,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1.
- [2] 郑家建.东张西望:中国现代文学论集[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22.
- [3] 南帆.文化记忆、历史叙事与文学批评[N]. 文学报,2018-06-28(18).
- [4] 孟丰敏.乡愁里的福州[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
- [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 [6]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1.
- [7] 谢有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J]. 散文百家,2003(2):47-49.
- [8]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191.

(责任编辑:许秀清)